

## 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析評

胡楚生\*

### 摘要

廖平師承王闡運，擅長《春秋》之學，不僅對於今文經學的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，加以推崇，同時，對於古文經學的《左傳》，也加以尊奉，他對三《傳》，都有不少專門的著述，其中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一書，則是他希望會同三《傳》要義的著作，他認為三《傳》同出一源，宏綱巨領，並無不同。

本文寫作的目的，即是探討廖平「折中」三《傳》的意見，並引用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的看法，與之對照，從而分析評論，以見廖平「會同」三《傳》的觀點，是否切實可行。

**關鍵詞：**春秋 廖平 傅隸樸 春秋三傳折中 春秋三傳比義

---

\*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開悟講座客座教授

## 一、引言

廖平（1852—1932）字季平，四川井研人，是晚清時代著名的經學家，他對於《春秋》一經，早期是推崇今文經學的《穀梁傳》，其次是《公羊傳》，但對於古文經學的《左傳》，稍後，也加以研治，並且，對於三《傳》，便進行了會通的工作。廖平在《四譯館經學目錄·序》中云：「昔治二《傳》（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），隔膜《左氏》，南皮師令撰長編，因得《三傳》會同之效。」<sup>1</sup>廖平研治《春秋》，由重視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，到兼而重視《左傳》，應該是受到其師張之洞的鼓勵與影響。

廖平長於《春秋》之學，對於三《傳》的研究，各有專門的著述多種<sup>2</sup>，一九一七年，廖平草成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一書，則是會通三《傳》義旨的著作。（此書由廖平弟子季邦俊就廖氏原稿補編而成）

在《春秋三傳折中·敘》中，廖氏說道：「自漢至今，言三《傳》者，喜言其異，不言其同，雖馬季良有《三傳異同說》一書，而異者自異，同者自同，初未敢於不同之中以求同也。三《傳》同係一源，必於不同之中以求同，斯為可貴。」又說：「《六經》有大小天人之分，而三《傳》無彼此是非之異，宏綱巨領，靡或不同，文字偶殊，不關典要。」<sup>3</sup>因此，廖氏主要以為，三《傳》同出一源，皆係解《春秋》之作，只有文字的偶殊，宏綱巨領，並無不同之處，治《春秋》者，當於《三傳》文字不同之中，求其義趣之相同，方為可貴之處。

李耀仙在〈廖平選集(下冊)內容評介〉一文中也說道：「歷來治《春秋》者，都泥于今古之見，若非黨同伐異，即老死不相往來。自東漢馬融《三傳異同說》至今日台灣傅隸樸《春秋三傳比義》，雖將《三傳》匯集起來，俱是異者自異，同者自同，尚非于不同中求同。廖平所作的『會同』工作成效如何，自有客觀評價，但他這種探索新道路的精神畢竟是可取的。」<sup>4</sup>

李氏在此文中曾提到傅隸樸先生的《春秋三傳比義》。

傅隸樸先生在《春秋三傳比義·自序》中說道：「經解之亂，未有甚於《春秋》的了，有心人欲整齊之，便起而作綜合性的批評，最早者當推漢末馬融的《三傳異同說》，其書已不可見，以下較為可觀者，則有唐陸淳所輯《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》，宋劉敞的《春秋權衡》，

<sup>1</sup> 引見李耀仙：〈廖平選集（下冊）內容評介〉，載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98。

<sup>2</sup> 廖平關於《公羊傳》的著作，較重要的有《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》三卷，《公羊解詁商榷》二卷，關於《穀梁傳》的著作，較重要的有《穀梁先師遺說考》四卷，《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十一卷，關於《左傳》的著作，較重要的有《左傳漢義補證》十二卷，《五十凡駁證》一卷。

<sup>3</sup> 廖平：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之〈敘〉，載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98。

<sup>4</sup> 李耀仙：〈廖平選集內容評介〉，載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98。

清初《欽定彙纂》，顧棟高的《三傳異同表》，最後的作者，當為清末民初的廖平的《春秋三傳折衷》，惜都辭義簡約，深入而未能淺出。」又說：「作者不揣其翦陋，撰為是書，以《傳》發《經》之微，以《經》正《傳》之謬，於三《傳》之得失，有可比較者，則比較其得失以為斷。」又說：「總期於比較中得其正確的解釋，能有涓滴之助於微言大義之領略。」<sup>5</sup>

因此，傅先生這部書，與廖平的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不同，廖氏之作，是在比較三《傳》之說後，求其義旨的「會同」，求其皆可通於《春秋》之經。傅氏之作，是在比較三《傳》之說後，求其義旨的孰是孰非，求其何者符合《春秋》之經。兩書基本目的，有此不同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一書，僅有二十九條，乃係舉例的性，而傅隸樸先生的《春秋三傳比義》，則是對於《春秋》及《三傳》，作出了全面性質的比較研究之書。

以下，先就廖氏書中，舉出十條例證，錄出《春秋》經文，三《傳》傳文，廖氏《折中》之意見，然後再取相同問題的傅氏見解，作出比較。

廖氏之書，對於《春秋》三《傳》，是以「求同」為其目的，因此，在該書的二十九條例證之中，我們相信廖氏都已達到「於不同之中以求其同」的目標。傅氏之書，對於《春秋》三《傳》，是以比較其義，務使「異者自異，同者自同」為目標。

對於廖氏「會同」三《傳》的意見，我們再取傅氏「比較」三《傳》的意見，作為對比。如果廖氏傅氏二人的意見大體相近相似，我們則初步認為《春秋》三《傳》此條的要旨大義是可以會通折中的。反之，如果廖氏傅氏二人的意見大體相反相左，我們則初步認為《春秋》三傳此條的要旨大義是不易會通折中的。當然，在對於三《傳》說解的文字方面，我們儘量略其「偶殊」的地方，而儘量從「宏綱巨領」的《春秋》要義能否契合處去作闡釋。

## 二、三《傳》可以「折中」之例

### （一）論魯莊公築王姬之館于城外

《春秋》莊公元年記曰：

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<sup>5</sup> 傅隸樸：《春秋三傳比義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下引並同。

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為外，禮也。<sup>6</sup>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築之，禮也；于外，非禮也。于外，何以非禮，築于外，非禮也。其築之何以禮？主王姬者，皮為之改築。主王姬者，則易為必為之改築？於路寢則不可，小寢則嫌，群公子之舍，則以卑矣。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。<sup>7</sup>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築，禮也。于外，非禮也。築之為禮，何也？主王姬者，必自公門出，於廟則已尊，於寢則已卑，為之築，變之正也。築之外，變之為正，何也？仇讎之人，非所以接婚姻也，衰麻，非所以接弁冕也。其不言齊侯之來逆，何也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。

8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經》書築館于外，三《傳》異文：《左氏》謂「于外為禮」，《公羊》謂「于外非禮」，《穀梁》：「築（之），禮也。」「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。」先儒不得其解，於是各師一說，無敢求通。今考《經》例外當地不地，非外也。莊公忘親事仇，實築於內，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於外，外王姬即以外齊侯，使齊侯未嘗至國者然。《左氏》就仇齊言，故云於外為禮，所以避公與齊接也。《公羊》就主婚言，故云：「于外非禮」，所以惡公輕王姬也。《穀梁》「于外非禮」，即《公羊》主婚之說，「築之外，變之正」，即《左氏》仇齊之說。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，各言一節，《穀梁》合之，其義始全。是此條三《傳》互異而義則相通，說者當據此為準，不可一見異文，遂求相反，則於《經》義斯為得矣。<sup>9</sup>

<sup>6</sup> 《左傳注疏》，台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下引並同。

<sup>7</sup> 《公羊傳注疏》，台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下引並同。

<sup>8</sup> 《穀梁傳注疏》，台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下引並同。

<sup>9</sup> 廖平：《春秋三傳折中》，載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98。下引並同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元年記「夏，單伯逆王姬，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，單伯送王姬來魯，魯必需為之準備館舍，於是築王姬之館于城外，《左傳》以為築館於城外，「禮也」，是合於禮的行為。《公羊傳》以為天子嫁女於諸侯，使魯國（與周天子同姓）諸侯為之主婚，為之築館舍，固然是合禮的行為，但是，為之築館舍於城外，便不合禮制了。《穀梁傳》以為「築，禮也，于外，非禮也」，與《公羊傳》相同。

廖氏以為，因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，周莊王嫁女於齊襄公，又使魯為之主婚，「莊公忘親事仇，實築於內，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於外，外王姬即以外齊侯，使若齊侯未嘗至國者然」，「《左氏》就仇齊言，故云於外為禮，所以避公與齊接也。《公羊》就主婚言，故云於外非禮，所以惡公輕王姬也」，又以為，《穀梁》「于外非禮」，即《公羊》主婚之說，「築之外，變之正」，即《左氏》仇齊之說，「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各言一節，《穀梁》合之，其義始全」，「是此條三《傳》至異而義則相通，說者當據此為準，不可一見異文，遂求相反，則於《經》義，斯為得也」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對於《左傳》的見解，先引《杜預注》說：「公在諒闇，虞齊侯當親迎，不忍便以禮接于朝，又不敢逆王命，故築舍于外。」以為杜氏之說，所謂「不忍」，是指齊襄謀殺桓公，若來親近，則必須行廟見之禮，此時桓公已入廟，莊公怎忍心讓殺父的仇人出現在父親的廟中，且親自接待他呢？故築館於城外，齊襄如親來迎娶，就可在城外行禮，不必入城廟見了。「此說甚合情理」，但又以為，這是杜預竊取《穀梁》的意思，不是《左氏》的本義。至於《公羊傳》的見解，傅氏以為，宮室中國君所居之路寢與小寢，以及國君諸女的房寢，皆不適於王姬之居，故築王姬之館是合理的，但築于城外，就不合理了，因為城外的防護，不如城內的安全，漠視王姬之安危，是非禮的，「這一論極為通達」。至於《穀梁傳》的見解，傅氏以為，「築，禮也，于外，非禮也」，與《公羊傳》全同。故傅氏以為，「三《傳》相較，當以《公羊》為明確」。

是以《春秋》此條之義，三《傳》所解，可以會通折中，廖氏傅氏所見，也皆無殊。

## （二）論齊襄公來魯逆王姬

《春秋》莊公十一年記曰：

冬，王姬歸於齊。

《左傳》記曰：

冬，齊侯來逆共姬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何以書？過我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其志，過我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經》不書字者，以王姬尊不能以伯仲見，與內女不同，《公》、《穀》皆云：志者過我也。《春秋》過我不志者多矣。此言因過而可志，不謂不過則不志。過我者，實送女於我，使我主婚也。攷春秋前時局，如今外人，男女無別，同姓為婚，齊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，與日本男親王必配女親王事同。孔子發明種學，使人以禮，別於禽獸，于是制同姓不婚之禮，然又與舊行之典相妨，不能兩通，於是定公主之制，使既仍貴賤不相為禮，又為同姓不婚。此《春秋》撥亂反正之一端，而亦可因新禮之文明，以攷見舊俗之蠻野者也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十一年記「王姬歸于齊」，《左傳》以為「齊侯來逆共姬」，指齊桓公來魯國迎娶王姬，《公羊傳》與《穀梁傳》皆以為「過我」，指「時王者，嫁女於齊，塗過魯」（何休注），三《傳》所解，大義無殊。

廖氏則以為，「過我者，實送女於我，使我主婚也」，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「天子不能與諸侯為敵體，故王姬下嫁，必使同姓諸侯（按天子與魯君皆姬姓）主婚，《左傳》不明言代王姬主婚，而云齊侯來逆共姬，也是用側敘文筆」，其義與廖氏之說相同。至於廖氏所說，「孔子發明種學，使人以禮，別於禽獸，于是制同姓不婚之禮」，「此《春秋》撥亂反正之一端」者，則於經文之內，並無所見，廖氏所言，不免推測過遠。要之，《春秋》此條所敘，三《傳》所解，大義無殊，廖氏與傅氏所釋，也大體相同。

### （三）論魯莊公會齊桓公盟于柯

《春秋》莊公十三年記曰：

冬，公會齊侯明于柯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冬，盟于柯，始及齊平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何以不日？易也。其易奈何？桓之盟不日，其會不致，信之也。其不日何以始乎此？莊公將會乎桓，曹子其曰：「君之意何如？」莊公曰：「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。」曹子曰：「然而君請當其君，臣請當其臣。」莊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會乎桓，莊公升壇，曹子手劍而從之。管子進曰：「君何求乎？」曹子曰：「城壞壓境，君不圖與？」管子曰：「然而君將何求？」曹子曰：「願請汶陽之田。」管子顧曰：「君許諾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曹子請盟，桓公下與之盟。已盟，曹子操劍而去之。要盟可犯，而桓公不欺，曹子可仇，而桓公不怨，桓公之信，著乎天下，自柯之盟始焉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曹劌之盟也，信齊侯也。桓盟，雖內與不日，信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曹劌劫盟事，見於子史，無慮數十百見，不應虛偽。而《左傳》無其文者，亦如《公羊》但言《經》例，不及事實之《傳》，其實已包於「始及齊平」之內。前此齊魯兵爭，以後和好，非有要盟事，而何以云「始及齊平」乎？是《傳》不言者略之也。後儒謂《左氏》專詳事，《公》、《穀》專詳例，不知二《傳》所有之事，多為《左氏》所無，

而此即其一端也。三《傳》同出一源，本無異例，不過記事各有詳略而已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十三年記「公會齊侯盟于柯」，《左傳》不載曹劌劫桓公之事，而《公羊傳》則詳記其事，又特為稱許桓公，以為「桓公之信，著乎天下，自柯之盟始焉」，而《穀梁傳》則略言其事。

廖平以為，曹劌劫盟之事，《左傳》無其文，其實已包於「始及齊平」四字之內，《左傳》不明言，蓋略之也。因前此齊魯兵爭，以後和好，非有要盟事，則《左傳》何以言「始及齊平」，側重一「始」字乎？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亦以為，「乾時之役，齊敗魯師，而迫魯殺子糾，長勺之役，魯敗齊師，後又退齊宋聯軍於郎，敗宋於鄆，兵連禍結，幾無寧日。此時桓公欲修伯業，故為柯之盟，與魯言好」，以為《左氏》曰：「始及齊平也。」乃「隱示《經》義在獎齊魯之釋怨修好」。其說與廖氏之說，大略相近。則三《傳》釋「盟于柯」之事，雖「各有詳略」，而其要義，則相同也。

#### （四）論魯莊公與諸侯會同于幽

《春秋》莊公十六年記曰：

冬，十有二月，（公）會齊侯、宋公、陳侯，衛侯、鄭伯、許男（伯）、曹伯、滑伯、滕子同于幽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同盟於幽，鄭成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同盟者何？同欲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同者何？有同也。同尊周也。不言公，外內寮一疑之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春秋》書同盟者十六，因此為其始。凡齊同盟皆為尊周，晉同盟皆為外楚。此會大國言宋、齊，小國言滑、滕，則天下諸侯皆至之辭也。《春秋》自青州卒正而外，惟敘許，而天下卒正皆在，何以此會言滑？滑者豫州卒正也。《左傳》言三帥襲滑，晉敗之於淆（殺）。是滑當為晉之屬國，不在常敘之十八國內。又不書會盟，不記卒葬，何以此會敘之？蓋敘者起晉在也。晉於周為同姓，《左傳》云：「周之宗盟，異姓為後。」使敘晉則當先齊，《春秋》以桓主盟，不能在他國下，嫌於見晉，又嫌於無晉，故敘一滑作以起之，此《春秋》微而顯隱而見義之說也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十六年記「夏，宋人、齊人、衛人伐鄭，秋，荊伐鄭，冬，十有二月，（公）會齊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鄭伯、許伯（男）、曹伯、滑伯、滕子同于幽」，《左傳》謂「同盟於幽，鄭成也」，以為諸侯結盟，主要是為了鄭國而訂立和約，《公羊傳》謂「同盟者何？同欲也」，以為乃是諸侯之間，同心共欲，皆願結盟，《穀梁傳》謂「同尊周也」，以為諸侯結盟，乃是共同想要尊奉周天子，至於「不言公，外內寮，一疑之」，則是以為《經》文中未記魯莊公與會，是遠近諸侯皆懷疑魯莊公是否願共推齊桓公為盟主。

廖氏以為「《春秋》書同盟者十六，而此為其始，凡齊同盟皆為尊周，晉同盟皆為外楚」，此次會盟，晉國未在其中，廖氏以為，「此會大國言宋、齊，小國言滑、滕」，「滑當為晉之屬國，不在常敘之十八國內」，「何以此會敘之？蓋敘者起晉在也」，「使敘晉則當先齊，《春秋》以桓主盟，不能在他國下，嫌於見晉，又嫌於無晉，故敘一滑作以起之 此《春秋》微而顯隱而見義之說也」，主張此次會盟，齊桓公為盟主，晉國實在其中，而不欲使晉居齊前，乃敘其屬國滑，以作補充之說明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則以為，「《春秋》書同盟者十六，屬齊桓者二，屬晉者十四，《穀梁》家以為屬齊桓者都是尊周，屬晉者都是病楚。全用臆解，毫無根據」，又以為，「《左傳》經文，會上無公字，杜注：『不書其人，微者也。』《公羊》經文上有公字，但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減國下篇》言：『幽之會，莊公不往。』是董仲舒所見《經》文，本無公字，故《公羊》經文之公字似屬衍文。《穀梁》以為不書公會，是因公與齊有戴天之讎。寮字同僚，指諸侯，外內指遠近，言遠近諸侯都懷疑莊公是否當列會與諸侯共同推尊桓公為伯。一疑之一，作都

解，因有此疑點，故《經》不書公。據此，則莊公實會同諸侯共推桓公為伯，莊公之忘父讎，尚不忘與齊襄打交道，何至忌與桓公為會？諸侯疑其當否，正足以見其不當。但《穀梁》於此見得不夠明確，故其《傳》文也顯得艱澀不順。三家解釋要以《左傳》為簡當明白。」

是以傅氏雖不贊同「齊盟皆屬尊周，晉盟皆屬病楚」之見，亦未論及「幽之盟」，晉國是否與會，但於三《傳》論及「幽之盟」，其目的乃為鄭國被侵而訂立和平盟約，則均無異義，此則廖氏傅氏之見，大略相同。

### （五）論魯僖公之女季姬與鄫子遇于防

《春秋》僖公十四年記曰：

夏，六月，季姬及鄫子遇于防，使鄫子來朝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鄫季姬來寧，公怒，止之，以鄫子之不朝也，夏，遇於防，而使來朝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？內辭也。非使來朝，使來請己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遇者，同謀也，來朝者，來請己也。朝不言使，非正也。以病繒子子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季姬及鄫子事，《公》、《穀》以為請己，《左傳》以為使來朝，服氏說，季姬不繫國，為未嫁辭，與伯姬（僖九年書卒）、子叔姬（文十二年書卒）同。如謂己嫁，則當繫國，與紀伯姬（莊四年書卒）、紀叔姬（莊二十九年書卒）同。下年歸鄫之書不為贅文乎？紀叔姬歸鄫（莊十二年）本己嫁，故繫國，國而曰歸。鄫，邑也。不繫國無以知為紀邑。又若別一叔姬者然，前書歸為始嫁，後書歸為失國，與此不同。婦人謂嫁

曰歸，伯姬、叔姬之歸紀（隱七年）、歸杞（莊二十五年）、與歸宋（成九年），書。其例不異，況伯姬為季姬之姊，卒不繫國（僖九年），則季姬不繫國為未嫁，更無疑義。《白虎通·嫁娶篇》云：「《春秋》伯姬卒時，娣季姬更嫁鄆子。」昏禮嫡未往而死，媵亦當往，以媵為嫡，即諸侯不再娶之義。何君因更嫁之說，謂季姬先許于邾，季姬淫佚，改嫁于鄆，遂以執鄆子，用之附會於此，《傳》無其文，未為確證。又云：「魯不防正，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佚，使來請己。」此為當日實事。夫諸侯女出，侍從必多，而舊染相安，彼此習慣，以前男女無別，面訂昏姻，不由媒妁，隨處媾和。魯莊尸女，諱言觀社。徐女擇壻，任意委禽。僖公雖賢，聲姜雖淑，爭于習尚，恐難禁遏。不得據今日之民風，疑舛昧之汚俗。撥亂反正，《春秋》偉功。《公》、《穀》使來請己，就實事而言，為微言派；《左傳》使來朝，就諱例而言，為大義派。《經》凡書及者，以尊及卑，以內及外，齊高固先書逆，後書及，已嫁之辭。季姬先書遇，後書歸，未嫁之辭。已嫁則從夫婦辭，故曰：「高固及子叔姬來。」（宣五年）。未嫁則從內外辭，故曰：「季姬及鄆子。」（近人褚摺升說）。《曲禮》：「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。」遇禮有器幣，有饋相。言遇者，比之諸侯，變無禮為有禮，所謂諱例也。或疑《左傳》「鄆季姬來寧」，因誤以為已嫁。〈凡例〉：「諸侯之女，歸寧曰來」、「杞伯姬來」是也（莊二十七年）。今《經》不言來，《左氏》豈自違其例乎？又疑歸寧不當留魯至五月之久，然莊世姜氏和齊，動逾數載，文世夫人如齊，未越一時。杜氏《釋例》：「女子既嫁，有時而歸。」人情之常，何關久暫。不過《公》、《穀》就事實言，昏姻自由，不可為訓，故《左傳》言來寧，為親諱惡，亦如《莊二十七年》「杞伯姬來」，後即書「杞伯來朝」之例。此三《傳》各言一端，所以並無異義也。

今案《春秋》僖公十四年記「夏六月，季姬及鄆子遇於防，使鄆子來朝」，《左傳》以為魯季姬自鄆國回到魯國歸寧，因鄆子不同時來魯國朝見，故僖公怒，及至夏日，季姬與鄆子在防地相見，季姬乃使鄆子來魯朝見僖公。《公羊傳》以為季姬使曾子朝魯，不過是魯國的飾辭，其實是季姬使鄆子來魯國請娶己為夫人。《穀梁傳》以為季姬與鄆子相見而相謀，以便使鄆子來魯，表面朝見僖公，目的則在聘娶季姬。

廖氏以為，《春秋》記季姬而未記魯國於其前，「為未嫁辭」，故《公羊傳》及《穀梁傳》以季姬使鄆子來魯聘己。《左傳》以為「季姬來寧」，為平僖公之怒，故相遇於防，使鄆子來朝魯，是指季姬為已嫁之時。廖氏以為，「《公》、《穀》使來請己，就實事而言，為微言派。《左傳》使來朝，就諱例而言，為大義派」，「此三《傳》各言一端，所以並無異義也」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「關於此《經》的解釋，僅就三《傳》文字看，並無大異」，「因季姬是僖公之女，嫁鄫子為夫人，返魯為父母請安，僖公怒鄫子不來朝，留季姬不令歸，欲以絕此婚姻，季姬乃私約鄫子來魯之防邑相會，使鄫子來朝僖公，以息僖公之怒，僖公果因鄫子之朝，而於明年九月讓季姬歸于鄫」。傅氏又以為，《公羊》說《經》書「使鄫子來朝」是內辭（即為本國裝飾之語），並不是事實，事實是教鄫子「來請己」，所謂「請己」，即請僖公放己（季姬）回鄫。「照此解釋，正與《左傳》的說法相符合。」《穀梁》也說「來朝者，來請己也」，與《公羊傳》義相同。

是以《春秋》此條所記，《三傳》之義，大體相同，廖氏傅氏所說，重點也無太多差異。

以上所舉五例，每例之中，三《傳》之義，大體皆可會通折中，而廖氏傅氏之說，也大體無殊。

### 三、三《傳》不易「折中」之例

#### （一）論魯桓公之子「同」生

《春秋》桓公六年記曰：

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，接以太牢，卜士負之，士妻食之，公舉文姜宗婦命之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子同生者，孰謂？謂莊公也。何言乎子同生？喜有正也。未有言喜有正者，此其言喜有正何？久無正也，子公羊子曰：「其諸以病桓與？」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疑，故志之，時日同乎人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經》書「子同生」一條，三《傳》文義未備，先儒多臆為之說。如何氏云：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，明欲以正見無正也。」蕭氏曰：「桓公殺（弑）兄竊國，王法所誅絕，故於同生不書世，言不得繼世享國也。」孔氏說《春秋》又謂：「莊公書者冢嫡，不書者非冢嫡。」紛紛異說，皆未得《經》旨。今按杜氏《春秋釋例·母弟篇》：「《傳》稱季友文姜之愛子，與莊公同生，故以死奉般。」又《左傳》於文姜生季友時，記桓公卜筮之事，蓋莊公與季友本為雙生，及既生莊公後，文姜腹中猶震，故桓公卜之，蓋未知其為雙生否也。《史記》謂季子母為陳嬀，是文姜雙生，不能兼養，故屬妾陳女養之，非真為陳嬀之子。《經》書「同生」，蓋志其雙生之謂也。《禮》：「生子三月（則）父（母）名之。」是《經》於初生，本無例名之義。又春秋十二公之名，例不見《經》，何至莊公生時，獨書其名。種種證驗，則同為雙生之說審矣。禮說文家據見立先生，質家據本意立後生，皆所以防愛爭立也。莊公與季友同生，其尊卑也微，《經》惡長幼爭立之禍，故直書同生，使人重別。《穀梁》：「疑，故志之。」即雙生形貌易於疑惑，非若舊說所謂齊襄之子。《公羊》：「其諸以病桓與？」即謂《經》書「同生」之意，蓋感於隱桓而發。《穀梁》「時日同乎人」，是與莊公與季友同生而言。《公羊》同謂莊公，是單就世子一人而言。兩相比較，其義益彰。餘若《左傳》謂莊生與桓同日，是蓋先儒記事之誤，非《經》義，與三《傳》不合也。

今案《春秋》桓公六年記「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」，《左傳》記桓公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」，又記桓公曰，「是其生也，與吾同物，命之曰同」（杜注：「物，類也，謂同日。」）《公羊傳》以為莊公之生，「喜有正也」，喜國有嫡正之嗣子，《穀梁傳》以為「疑，故志之，時日同乎人也」，以為莊公之母文姜，淫于齊襄公，故疑莊公非桓公之子（本范寧注）。

廖氏以為「三《傳》文義未備，先儒多臆為之說」。又以為，「《經》書同生，蓋志其雙生之謂也」，「種種證驗，則同為雙生之說審矣」，以為「莊公與季友同生，其尊卑也微，《經》惡長幼爭立之禍，故直書同生，使人重別」。並以為《公羊傳》亦「感於隱桓（弑立）之事而發」，義與《左傳》相同，《穀梁傳》義亦相近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「《左氏》詳舉太子之禮，及命名之義，說明了《經》之所以書子同生者，由於桓公如此重視太子之生，故魯史特書於策」，「足破後人一般以為係夫子別嫌明微，以示莊公確為桓公之子，而非齊襄之私生子之猜說」，傅氏又以《公羊傳》之說，「與《左氏》暗合」，也有隱刺桓公篡弑之意。至於《穀梁傳》之說，傅氏則以為「荒謬無理」，並引朱子之說反駁，以證莊公非齊襄公之私生子。然則《春秋》此條，三《傳》之說，既不相同，廖氏傅氏之見，也未能折中近似也。

## （二）論魯莊公不稱「即位」

《春秋》莊公元年記曰：

元年春，王正月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元年春，不稱即位，文姜出故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何以不言即位？《春秋》君弑，子不言即位，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？隱之也。孰隱？隱子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繼弑君，不言即位，正也。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，何也？曰，先君不以其道終，則子不忍即位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莊元年不書即位一條，《公》、《穀》謂「繼弑君，不言即位」，《左氏》謂「文姜出故」，「不稱即位」。杜氏誤解《傳》文，遂謂莊公因文姜不在國，不行禮，故「不稱即位」。

不知二《傳》所言為書法，《左氏》所言為事實。《左氏》謂「文姜出」，即見公弑於齊，謂「文姜出」，「不稱即位」，即與二《傳》「繼弑君，不言即位」之義同。《春秋》於魯諱弑不書，則亂賊之名無由見，故《經》借即位之書不書以明繼君之與弑不弑，如隱、莊、閔、僖之不言即位，所以明其無爭國之心也；桓弑隱，宣弑子赤之書即位，所以明其有奪國之志也。二《傳》就《經》意立言，故直書曰：「繼弑君，不言即位」，所謂以微言說《經》者是也。《左氏》不以空言解《經》，故所言每就事實立義，所謂以大義傳《經》者是也。考《春秋》繼弑君不書即位者三，《左氏》解之各條皆不相同，除此條而外，如閔不言即位，《傳》曰：「亂故也」，僖不言即位，《傳》曰：「公出故也」。以聖經絕不可易之例而各就事實出，是其借事立義之確證也。苟探其本，則閔之亂，僖之出，亦不過因先君遇弑而已，與《公》、《穀》所謂「繼殺君，不言即位」之義莫不符同，相比而觀，其義自見。所謂三《傳》同出一源，固昭昭也。杜氏以《經》為仍魯史之舊，終於不書即位之條，概以行禮不行禮為斷，使果如其說，則文姜三月方孫，莊公何故正月不能行禮？若謂文姜感公之意而還，則公已忘文姜弑其父矣，何以三月又孫於齊？是知文姜之出，本無歸文，下言孫者，《經》義絕之。其實公之不言即位，斷非若杜說然也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元年記「元年春，王正月」，《左傳》以為莊公「不稱即位」，是由於夫人文姜與桓公赴齊，桓公為齊襄公所殺，文姜不敢還國，故稱「文姜出」（本於杜注），《公羊傳》以為「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？隱之也」，是由於為人子者痛於君父之禍，故不忍稱即位，《穀梁傳》以為「先君不以其道終，則子不忍即位也」，其義與《公羊傳》相同。

廖氏以為，「謂文姜出，即見公弑於齊，謂文姜出，不稱即位，即與二《傳》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義同」，「二《傳》就《經》意立言，故直書曰『繼弑君，不言即位』，所謂以微言說《經》者是也。《左氏》不以空言解《經》，故所言每就事實立義，所謂以大義傳《經》者是也」，故以為三《傳》之義，莫不符同，「相比而觀，其義自見。所謂三《傳》同出一源，固昭昭也」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如《左傳》之說，則「莊公不因父被殺於齊，戴天之仇未報，而不忍即位，乃因其謀殺君夫之淫母出，而不忍即位，則莊公尚稱得為人子嗎？」，且「桓公薨於齊，《經》書喪歸，亦未言姜氏同歸，這一出字從何生根？雖杜預多方為之彌縫，終不能言之成理，《左傳》本以史實見長，此《傳》則於史實義例，一無可取」。又以為，如據《公羊傳》之說，「《春秋》君弑，子不言即位，何以不言即位呢？因夫子為子悲痛，不忍言即位，似乎莊公曾行即位大典，因夫子憐其喪父，故不言即位，不知夫子筆削之義，在譏

莊公之忘父仇不報，而妄為隱子之說，《公羊》此傳，殊失情理」。又以為，如據《穀梁傳》之說，「繼被弑之君即位者，例不言即位，此《傳》實得《經》義之正」。

是以廖氏以為三《傳》之義，「莫不符同」，而傳氏以為三《傳》各有其說，唯《穀梁傳》之說能「得《經》義之正」，則兩人之見解，並不相同，就是孰非？猶待論定也。

### （三）論「星隕如雨」

《春秋》莊公七年記曰：

夏，四月，辛卯，夜，恆星不見。夜中，星隕如雨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夏，恆星不見，夜明也。星隕如雨，與雨偕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恆星者何？列星也，列星不見，何以知？夜之中，星反也。如雨者何？如雨者非雨也。非雨則曷為謂之雨？不修《春秋》曰：「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。」君子修之曰：「星隕如雨。」何以書？記異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恆星者，經星也。日入至於星出，謂之昔。不見者，可以見也。「夜中，星隕如雨」，其隕也如雨，是夜中與？《春秋》著以傳著，疑以傳疑。中之幾也，而曰「夜中」，著焉爾。何用見其中也？失變（失當為天字之誤）而錄其時，則夜中矣。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？我知恆星之不見，而不知其隕也。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，則是雨說也。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，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，豈雨說哉？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春秋》記時之詳，惟此為最，時、日、月之外，一夜之中，又分時刻。此記事之體，應如此也。惟《經》書「星隕如雨」句，杜氏讀如為而，謂星隕時實有雨，遂與二《傳》立異。不知《穀梁》云：「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，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。」此書者非星也，謂空中雜質飛行，欲書雨則只見於上，欲書隕則不著於下，故書曰「星隕如雨」，謂其似隕而又如雨也。《左傳》「與雨偕」者，謂此雖如星隕之隕，而又同於雨雪之雨，與《穀梁》同，《公羊》「如雨者，非雨也」，謂不盡如雨雪之雨，亦與《穀梁》同。舊說謂三《傳》互異，皆杜氏誤解《傳》文之所致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七年記「夜中，星隕如雨」，《公羊傳》以為「如雨者非雨也」，《穀梁傳》以為「其隕也如雨」，皆以為星之隕落，其多如雨之下，《左傳》以為「與雨偕也」，則是以為星之隕落，雨也同時而下。是《左傳》與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，所解本不相同。廖氏則以為，「星隕如雨」句，「杜氏讀如為而，謂星隕時實有雨，遂與二《傳》立異」，遂將三《傳》互異之責任，推予杜預，不知杜氏僅依《傳》作訓而已，廖氏並謂，「此書者非星也，謂空中雜質飛行」，「謂其似隕而又如雨也」，不免曲解《傳》文，有意強求《三傳》之同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《左氏》解「星隕如雨」為「與雨偕也」，故杜注「如，而也」，「星隕如雨，即星隕而且落雨，這個如字很重要，如果說星像雨一樣落，天上有多少星可以落？那是荒唐之言，《左氏》這一解釋最為合理合事實」，傅氏又提到范寧注「星隕如雨」謂「星既隕而復雨」，也與《左傳》相同。

要之，《春秋》此條記「星隕如雨」，三《傳》之說，實不相同，廖氏強求其同，未免牽合。

#### （四）論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

《春秋》莊公二十七年記曰：

公子友如陳，葬原仲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非禮也，原仲，季友之舊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公原仲者何？陳大夫也。大夫不書葬，此何以書？通乎季子之私行也。何通乎季子之私行？避內難也。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。內難者何？公子慶父、公子牙、公子友，皆莊公之母弟也。公子慶父、公子牙通乎夫人（哀姜）以脅公，季子起而治之，則不得與於國政，坐而視之，則親親，因不忍見也。故於是復請至於陳，而葬原仲也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言葬不言卒，不葬者也。不葬而曰葬，諱出奔也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《春秋》諸侯大夫無書葬者，此何以書「葬原仲」？蓋季友賢公子也，《春秋》避其出奔，故託之於「如陳葬原仲」，以為魯諱，以原仲之不當葬而葬，明季友不當出而出。此為外大夫書葬之一見例，而又因之以明監大夫死則葬於外國之禮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通乎季子之私行」，通之云者，通其意也，謂本為出奔，特《春秋》通其意以為私行，而為魯諱，是與《左氏》「非禮」，《穀梁》「內諱」之意實同，據此而觀三《傳》無異辭矣。

今案《春秋》莊公二十七年記「公子友如陳，葬原仲」，《左傳》以為公子友私自前往陳國會葬友人原仲，並未奉到國君之命令，是「非禮」的行為。《公羊傳》則以為前往陳國會葬友人，只是公子友的私人行為，其目的只是為了避開國內的災禍，因為，公子友與公子慶父、公子牙，都是莊公的兄弟，公子慶父與公子牙卻與莊公的夫人私通，公子友想要糾正二人，卻不得權力，坐視不理，卻又不忍見國事家事之敗壞，於是才藉故前往陳國。《穀梁傳》則以為《春秋》此處，記原仲之「葬」，卻未嘗記原仲之「卒」，是為公子友出往他國作隱諱。

廖氏以為「《春秋》諸侯大夫無書葬者」，此條何以書「葬原仲」？因公子友賢，故《春秋》言「如陳葬原仲」，以為魯國隱諱，以見原仲之不當葬而言葬，公子友不當出而言出，此是「外大夫書葬之一見例」。又以為《公羊傳》所謂「通乎季子之私行」，乃是公子友本為出奔，「特《春秋》通其意以為私行，而為魯諱」，因此，是與《左傳》所言「非禮」，《穀梁傳》

所言「內諱」之意，是相同的，因而主張，「據此而觀，三《傳》無異辭」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《左傳》於本年《經》文「公會杞伯姬于洮」下已言「卿非君命不越境」，今公子友自行出境葬鄰國之大夫，故《傳》以為譏：「非禮也」。又以為，《公羊傳》記公子友「請命於莊公而往陳國葬原仲，實際上乃是避叔牙慶父之難」，又引啖助之說曰：「大夫適他國會大夫葬，惡也，書之適以加惡，何名通其私行乎？」以反駁《公羊傳》之說。傅氏又以為，《穀梁傳》謂「言葬不言卒，不葬者也」，按《經》書葬者，乃明季友之行，「是為季友書，並非為原仲書，原仲為陳國大夫，豈有魯史為陳國大夫書卒之例？」傅氏又引《春秋彙纂》之說曰：「人臣無境外之交，季友越國會葬，故《春秋》直書以示貶，《公》、《穀》之說皆非也。」至此，傅氏以為，「三《傳》應以《左》義為是」。

要之，《春秋》此條所記，廖氏以為「三《傳》無異辭」，傅氏以為「三《傳》應以《左》義為是」，則是欲求折中三《傳》之義，恐猶有待也。

## （五）論鄭伯克段于鄆

《春秋》隱公元年記曰：

鄭伯克段于鄆。

《左傳》曰：

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鄆。」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稱鄭伯，譏失教也，謂之鄭志，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

《公羊傳》曰：

克之者何？殺之也。殺之則曷為謂之克？大鄭伯之惡也。曷為大鄭伯之惡？毋欲立之，已殺之，如勿與而已矣。

《穀梁傳》曰：

克者何？能也。何能也？能殺也。何以不言殺？見段之有徒眾也。段，鄭伯弟也。何

以知其為弟也？殺世子母弟目君。以其目君，知其為弟也。段，弟也，而弗謂弟；公子也而弗謂公子，貶之也。段失子弟之道也，賤段而甚鄭伯也。何甚乎鄭伯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。心欲殺也，故不言出奔矣。

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曰：

按鄭伯克段一事，《公》、《穀》謂殺，《左傳》謂奔，杜氏本《傳》說謂弟害兄則去弟罪段，何氏本《公羊》說謂「嫌鄭伯故變殺言克」。諸家言各一端，於《經》義皆有未逮。今考《經》例，「殺世子母弟目君」，如「天王殺其弟年夫」、「晉侯殺其世子申生」之類是也。「殺大夫不目君」，如書「宋殺其大夫」、「衛殺其大夫」之類是也。《經》目鄭伯，故知段非大夫，下諱鄭忽，故知段非世子。段為母弟，一望而知。又《經》云：「克段」，《左傳》云：「如二君，故曰克。」又一條云：「得獲曰克。」《經》例「獲器用曰得，得牛馬曰獲。」《經》書克者，謂既獲其人，又得其物，亦如「武王克商」之意，非若何注「嫌鄭伯故變殺言克」也。按《經》此事如書奔則與秦鍼同，如書殺則與年夫同，故以「克」字加之，然後鄭伯之陰謀始能畢露，又何計其為奔與殺哉。三《傳》各探其意而為之說，跡雖小異，實則相同，如《傳》云：「如二君」者，謂鄭伯養成段惡之辭，「譏失教」者，謂鄭伯處心害段之辭，綜而觀之，與《公》、《穀》惡鄭伯之意，莫不符合。是知《公》、《穀》稱殺，《左氏》稱奔者，不過各就「克」字之義，推衍說之，其實並無大異。

今案《春秋》隱公元年記「鄭伯克段於鄆」，《左傳》以為鄭伯與共叔段「如二君，故曰克」，《公羊傳》以為「克之者何？殺之也」，《穀梁傳》以為「克者何？能也，何能也？能殺也」，「賤段而甚鄭伯也」，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，成於殺也」。

廖平以為「諸家言各一端，於《經》義皆有未逮」，以為「《經》書克者，謂既獲其人，又得其物」，「故以克字加之，然後鄭伯之陰謀始能畢露」，故以為《左傳》之意，「與《公》、《穀》惡鄭伯之意，莫不符合」。

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以為，「克」字乃助動詞，無言外之義，並引孫復《春秋尊王發微》之說曰：「克者力勝之辭，因隱公與段，兄不成兄，弟不成弟，故《經》文交譏之。」並以為，《左傳》隱公十一年記鄭莊公之言曰：「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協，而使餬其口於四方。」是共叔段並未被殺。故「克」與「出奔」，在行文上是相為照應的，由於莊公「克」，故段「出

奔」，由於段「出奔」，故「克」不是「殺」，夫子以為此種天倫之變，不足以垂訓，用一「克」字點破經過，不必說到絕處。故傅氏以為，《公羊傳》訓克為殺，《穀梁傳》為避免襲取《公羊傳》釋「克」之跡，乃在「殺」字上加一「能」字，皆無據之詞。

比較廖氏與傅氏之見，就「克」字之解入手，則廖氏以「克」者「既獲其人，又得其物」，解「克」字為實有之義，加「克」字，「然後鄭伯之陰謀始能畢現」，故就「克」字之解釋而言，三《傳》意皆相同，皆惡鄭伯。而傅氏以「克」字乃助動詞，並非「獲得」之義，以此而解三《傳》，則《左傳》之說為是，而《公》、《穀》之說為非。要之，此條之中，廖氏必欲折中三《傳》之說，恐亦未必成功。

以上所舉五例，其三《傳》之解，各自異說，而廖氏傅氏所釋，也不易為之會通折中者。

#### 四、結語

廖平在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書中，舉出了二十九條例證，他自然是充滿了信心，相信此二十九條例證，都是可以會通三《傳》的義旨。或許，他還想藉此二十九條例證，推論其餘《春秋》中的《經》文，認為都可以會通三《傳》的義旨。

在前兩節中，我們就廖平所撰的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一書，選出了十條例證，作為分析比較的資料，這十條例證，在廖氏該書的二十九條例證之中，僅居三分之一。這十條例證，經過解釋分析，並取與傅隸樸先生《春秋三傳比義》書中同條的見解比較之後，可以見出，其中有五條，《春秋》三《傳》之說，是可以會同折中的。另外有五條，則《春秋》三《傳》之說，是無法會同折中的。

如果按照比率推論，則廖平的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書中的二十九條例證，其三《傳》要義可以折中與不易折中的數量，也約略應為十五條與十五條之比吧！

如果廖氏希望將折中三《傳》義旨之例證，推廣到其他的《春秋》經文，則依照比率，三《傳》不易折中的例子，也更將提高。

楊鍾義在批評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一書時說：「平謂言三《傳》者，喜言其異，不言其同，為之折中，以惠公仲子當從《穀梁》，母以子氏，比例成風，持論為有依據，餘多依違兩可，強作調人。」<sup>10</sup>楊氏「強作調人」的批評，也許過於苛刻，畢竟，廖氏會同三《傳》的用心與方法，仍然是值得人們欽佩的。

<sup>10</sup> 見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四，頁803。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3。

## 五、附論

由於討論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的問題，同時也延伸思考到另外兩個相關的問題：

### （一）研治《春秋》如何取徑的問題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春秋古經》十二篇，《經》十一卷，《左氏傳》三十卷，《公羊傳》十一卷，《穀梁傳》十一卷，《鄒氏傳》十一卷，《夾氏傳》十一卷。及至後世，《鄒氏傳》、《夾氏傳》亡佚，是以《春秋》五《傳》，僅餘三《傳》，西漢時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立為博士，是為今文經學，東漢時，《左傳》立為博士，是為古文經學。歷代學者研治《春秋》，大約有如下幾種途徑：

1. 兼治三《傳》，求其會通——如廖平的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所從事者。
2. 兼治三《傳》，求其是非——如傅隸樸的《春秋三傳比義》所從事者。
3. 專治一《傳》，酌參異說——如皮錫瑞所謂「《春秋》一經，尤重專門之學」，「學者宜專治一家」<sup>11</sup>的主張，以至分別研治三《傳》所從事者。
4. 不信三《傳》，獨據古《經》——如唐人盧仝所採「《春秋》三《傳》束高閣，獨抱遺《經》究終始」之主張<sup>12</sup>，以至如宋人孫復的《春秋尊王發微》所從事者。

因此，研治《春秋》之學，如何取徑入手，確實是學者們首先需要思考而抉擇的問題。

### （二）面對注疏如何從違的問題

《春秋》三《傳》，本以解《經》，三《傳》又各有注、有疏、有新疏，面對這一系列的注疏，以至於後世針對這些注疏所撰著的其他著作，我們又將如何去參考呢！

以《左傳》而言，有杜預之《注》，有孔穎達之《疏》，有劉文淇之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以及歷來許多有關《左傳》的著述。

以《公羊傳》而言，有何休之《注》，有徐彥之《疏》，有陳立之《公羊義疏》，以及歷來許多有關《公羊傳》的著述。

以《穀梁傳》而言，有范寧之《注》，有楊士勛之《疏》，有鍾文蒸之《穀梁補注》，以及歷來許多有關《梁梁傳》的著述。

<sup>11</sup> 見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》卷四，頁88，台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。

<sup>12</sup> 參拙稿：〈春秋三傳束高閣，獨抱遺經究終始？——盧仝《春秋摘微》析評〉，載《經學研究論集》，頁349—369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2002。

《傳》本以解《經》，但是，三《傳》所解之《經》義，已有不同之處。《注》本以解《傳》，但是，杜預、何休、范寧，所解之文字，是否能各得三《傳》之真，又已有疑。《疏》本以釋《注》，但是，孔穎達、徐彥、楊士勛所釋之文字，是否已能各得杜、何、范三《注》之真，又已有疑。《新疏》本以重新疏釋三《傳》及《注》，但是，劉文淇、陳立、鍾文蒸所疏釋之文字，是否已能各得三《傳》三《注》之真，又已有疑。推而至於其他有關《春秋》及三《傳》之著述（包括三部《經解》中的相關著作），其所闡釋，也都可以作如是觀。

因此，研治《春秋》，研治三《傳》，參考有關的注疏，是必要的步驟，但是，注疏是否「走失真義」，人們如何去參考注疏，而又儘量避免被誤導，也是需要注意的問題。因此，《經》、《傳》、《注》、《疏》、《新疏》，在參考引述時，彼此之間反複勘驗，力求客觀理解，也許是避免被誤導觀點，可以採取的方式。

另外，再進一步從問題的根本上看，當我們面對先聖的經典，面對先賢的注疏時，我們應該是儘可能地去「回歸原典」？抑或是允許無限制地去進行「創造的詮釋」？換句話說，研治經典，如果我們不願意「墨守陳規」，但又不願意「厚誣古人」時，那麼，兩者之間的距離或尺度，又如何拿捏？恐怕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。

由於討論廖平的《春秋三傳折中》，而引發了一些相關問題的思考，乃記之如上，以就教於高明。

